



陳翰笙

金仲华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新闻界人士。一九三八至四一年底，他在香港先后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和《世界知识》主编。那时我也在香港，他鼓励抗日战争，反对与敌人妥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二年春，宋庆龄、周恩来、潘汉年三位同志一致推举他为《中国建设》英文杂志编委会主席，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主持会议，我都亲聆他对外宣传的一些意见；他反对夸大事实，宣传真相，畅谈意义，使在座者无不钦佩。至今我还想念他。仲华同志确是我国新闻界的表率，值得我们仰慕。

请许多在港的国际问题研究者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形势和我国应采取的抗日外交政策。参加的主要有乔冠华、陈翰笙、郑森禹、张铁生、刘思慕、邵宗汉、羊枣、吴斐丹、廖承志和夏衍同志偶然也来参加，报告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

抗战胜利后，仲华和冯宾符同志又在上海恢复出版《世界知识》，除了一些老作者外，队伍进一步扩大了。其中主要的有姚臻、宦乡、刘尊棋、陈原、吴景崧、李纯青、梁纯夫、石啸冲等人。

第四，学习仲华同志热忱帮助、鼓励和积极培养年轻同志迅速成长。他在三十年代编辑《中学生》杂志时，曾约我设一“国际政治讲话”专栏，有系统地介绍国际问题的基本知识，后经补充修改，编成单印本，作为开明青年丛书之一。《世界知识》在香港出版时期，也是他鼓励我每期写稿，更鼓励我连续撰写“战时国际法讲话”，分期在《世界知识》刊出。

《世界知识》在仲华同志主编时期，特别注重形势地图配合文章内容。在他指导下先有沈振黄及其妹金端岑绘制的有关国际形势地图，非常受读者的欢迎。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又培养了采育莲绘制国际形势地图。他俩合作编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参考地图》，曾一再重版，深受读者的欢迎。

此外还要学习仲华同志非常重视普及国际知识和国际宣传工作。他为不少报刊杂志撰写介绍、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内容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易懂。在他主编过的许多报纸杂志，都以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见称，他不仅注意刊登图片、形势地图，而且刊登许多国际漫画，运用这种武器，向各国反动派大加挞伐。从版面编排来说，仲华同志确实开了一代报业史的先河。

仲华同志一生倾向革命，一心一意跟党走，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世界，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不愧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目前，我国国际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影响愈来愈大。我们要学习仲华同志的精神，为创造国际调研工作的新水平而努力。

(上接第3版)

(上接第3版)

目前,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高度集中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基本上非商品关系的、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统”,即“统收统支”(财政)、“统进统出”(外贸)、“统购统销”(商业)、“统包统配”(劳动)。“一统”的体制下,我们丧失了一种能够自动调节比例的经常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企业变成了行政管理部门的附属物,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造成责权利相分离,使企业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总之,现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在宏观经济上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微观经济上造成企业活力不足,无助于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确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抗战中期在香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仲华同志虽然先后担任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和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但仍兼任《世界知识》的主编任务。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不管工作多么忙，始终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培养了不少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材。仲华同志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一个世界闻名的新闻战士，他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他的良好学风和文风，即在目前看来，都还具有现实的意义。

坚持“以我为主”

首先，学习他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研究。在《世界知识》的创刊号中，胡愈之同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这意思是说中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密切相联，互为影响。还说我们介绍国际知识，研究国际问题，是为了认识世界，也是为了改变世界。研究国际问题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以我为主”，理论联系实际，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解放前，仲华同志长期负责主编《世界知识》，是坚决奉行这一“以我为主”的方针的。

把資料視為珍寶

其次，学习仲华同志非常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他的文章都是在大量的资料基础上经过分析综合研究后写成的。他口袋里常装书，为的是随时可以查阅资料。有一时期我们同住在旧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我常到他家中去，看到有好几个书柜都藏着整理分类好的资料。他不仅收集文字资料，而且还收集形势地图和国际漫画资料。解放后每次出国，他总要带一些有关的资料回来，有时还节省极有限的外汇生活费，购买有关的书籍。我去旅舍看他时，他总是非常高兴地拿出这些材料给我看，好像得了什么珍宝似的。

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外语是很重要的工具。仲华同志毕业于之江大学，后又在塔斯社和美国新闻处工作，英语本很娴熟，但他还要精益求精，以适应人民外交活动的需要。他有一次对我说：“我的英语虽有些基础，但还大大的不够，经过这几年努力学习，现在总算在口语和写作方面都能应付裕如了。”

通过一本杂志，联系团结一批人

第三，仲华同志长期负责主编《世界知识》，联系和团结了当时一批进步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对国际调研工作的开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三十年代，胡愈之同志以《世界知识》为中心，联系和团结了许多国际问题的作者，经常举行聚餐会或形势座谈会，对当前形势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分析形势的发展。这种聚会实际上就是《世界知识》编委会，对传播国际知识，正确认识世界形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经常参加的，有胡愈之、胡仲持、张仲实、钱亦石、钱俊瑞、郑森禹、章乃器、邵宗汉、金仲华和我等人。

上海沦陷后，一九三九年仲华同志在香港负责恢复出版《世界知识》，他继续发扬这个传统，经常约

一位杰出的国际问题专家

纪念金仲华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张明养

金仲华同志不幸含冤去世，到今年四月三日已是十五周年了。在这十余年的时间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仲华同志，他的神采和风貌就不时萦回在我的脑际。老友们对于他的过早离开人世，都感到无限痛惜。

我和仲华同志相交近四十年，深知他的为人。他自三十年代初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一直跟着党走，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参加人民外交活动，是一个国际闻名的和平战士，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立场鲜明，知识丰富，是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他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是一个很有素养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国际问题专家。

我于一九三〇年初次认识仲华同志。那时我大学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分配在《东方杂志》编辑部工作，他在《妇女杂志》社工作。我们虽然相识，但来往不多。一九三一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商务印书馆为日本帝国主义炮火所毁，我们大家都被遣散了。他后来进入开明书店帮助叶圣陶同志编辑《中学生》杂志。胡愈之同志主编

的《东方杂志》复刊后，我仍回《东方杂志》工作。商务印书馆在被毁前原来出版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和《妇女杂志》。因此《东方杂志》复刊后，特设“文艺”、“教育”和“妇女与家庭”三个专栏，代替原来的《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和《妇女杂志》，由原编辑徐调孚、郭一岑、金仲华在馆外负责编辑，按期将文稿送来。这些编辑事务上的联系是由我负责的，因此同仲华同志的接触就日益密切。

据我所知，仲华同志着重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是在上海进入苏联塔斯社工作之后（大概在一九三四年）。他在塔斯社担任翻译，天天接触到大量国际问题的材料，因此就对国际问题发生兴趣。一九三四年九月，胡愈之同志创办《世界知识》，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国际调研工作者，仲华和我都积极参加这个杂志的创刊和撰写稿件。

经营管理体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总的说来，前者反映现行上层建筑与发展中的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后者反映现行生产关系与发展中生产力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和统一来看，生产力是活跃的因素。从生产力的组成来看，活的劳动亦即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企业的活力，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职工群中自觉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剥削社会的受奴役者，是不会自觉劳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自觉劳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除那些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旧，创立那些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新。这就是破旧创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改革。

从一个职工来说，在「吃大锅饭」的体制下，千多千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的劳动，勤奋者吃亏，懒汉占便宜。有的职工自喻「端铁饭碗，喝大锅粥，拿封顶奖，干一般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供状」，试问还有多少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呢？

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几年企业有了一些小改革，企业的状况也有所改善，但毕竟因为没有全面触动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还不能说已经改变局面。例如，在目前部门和地区分割的情况下，一个企业不只是有一个「婆婆」，而是有许多个「婆婆」，办一件事要到处「磕头」，谁说了都算，谁说了又都不算，因为人人都有「否决权」。这样，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有些企业「吃不饱，饿不死」，暮气沉沉，缺少生机。